



占中九子案 深度

五问看清占中九子审判：香港首次有集会人士因“公众妨扰”罪成

为什么律政司要循普通法控告九子“公众妨扰”相关罪名？“公众妨扰”是什么？这次审判案例，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端传媒记者 杨子琪 发自香港 | 2019-04-09



2019年4月9日，占中九子案判决，九名被告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陈淑庄、邵家臻、张秀贤、钟耀华、黄浩铭和李永达到达法院。摄：林振东/端传媒

时隔近五年，有关2014年香港“占领中环”和“雨伞运动”的最重要判决，4月9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宣判。“占中九子”各人均有一项或以上控罪成立，全部与“公众妨碍”有关。有民主派法律人士认为，是次判决有机会对日后社会运动及言论、集会自由造成寒蝉效应。

4月10日，在各人陈情结束后，法官宣布休庭，“占中九子”全部获准保释，4月24日再行宣判刑期。

占中九子宣判原定于九点半开始，在开庭一小时前，庭外已有数百名市民到场支持九子，法庭内外公众席爆满，更有民众为了争夺公众席差点大打出手。到了开庭时间，媒体记者和支持者在法庭内外就绪，九名被告亦已坐在被告席上，6名庭警在旁待命，等待开庭的陈健民亦在入庭前把结婚戒指摘下，交由妻子保管。此时法官陈仲衡进入法庭并宣布，由于昨晚校对判词时发现出错，因此需要一小时重新印刷资料。法庭于一小时后重开，法官开始宣判结果。

“占中九子”均有“公众妨碍”相关罪名成立，其中“占中三子”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被控三项控罪，戴耀廷和陈健民两罪成立，朱耀明一罪成立。立法会议员陈淑庄、邵家臻，学联前成员钟耀华及张秀贤被控两项罪名成立。社民连副主席黄浩铭两项控罪均成立。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李永达则被控一项罪名成立。

佔中九子案初步判決

山而

2014.9.28

罪成

· 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



李永達

2014.9.28

罪成

· 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
· 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



黃浩銘

中環

2013.3-2014.12

罪成

· 串謀作出公眾妨擾



戴耀廷



陳健民



朱耀明

夏慤道

添美道

分域碼頭街

2014.9.27-28

· 煽惑他人作出公眾妨擾



戴耀廷



陳健民



陳淑莊

罪成



邵家臻



張秀賢



鍾耀華

罪成



朱耀明

無罪

· 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擾



戴耀廷



陳健民



朱耀明

無罪



陳淑莊



邵家臻



張秀賢

罪成

鍾耀華

註：4月9日上午10時許，法院宣佈休庭，並沒有將九人還押，下午繼續開審。

这九名民主派学者、政治人物及前学生领袖于2017年3月被警方落案起诉，案件于2018年11月19日开审，审理过程历时18天，九人均否认控罪。

这并非雨伞运动核心人物的首次受审及被定罪，但这是首次有核心人物因组织、参与运动而罪成，同时亦是香港首次以“公众妨扰”相关罪名控告参与集会的人士。在香港，因为参与未经警方批准的示威游行而被起诉的人士，通常以“未经批准集结”或“非法集结”等刑罚较轻的罪名被控。

双学（学联和学民思潮）三子黄之锋、罗冠聪和周永康曾在“公民广场案”被判刑，大律师公会前主席石永泰当时向传媒表示，“占中”参与者被检控，是“求仁得仁”、并非政治检控。而“占中三子”之一的戴耀廷则多次向传媒解释，“公民抗命”是以公开及有限度的违法行为以改变不公义制度，三子一直主张被捕后认“非法集结”罪，然而，他们认为警方所控的“公众妨扰”相关罪名存在法律问题，一旦罪成将影响香港未来社会运动，因此选择抗辩不认罪，惟最终在今天被判罪成。

占中九子案可能是香港史上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判决，究竟是次判决，将立下怎样的法律案例，对香港未来的社会运动发展造成什么影响？“公众妨扰”与“非法集结”相关罪名又存在什么重要分别？端传媒就案件梳理出五大法律相关问题，或能让读者更深入了解这次审判。

他們的傘後時代：後記



1. 占中九子被控什么罪？

最初，占中九子被控的并非“公众妨碍”有关罪名。2014年12月3日，金钟占领区清场前8天，“占中三子”戴耀廷、陈健民及朱耀明连同20多名“占中”参与者到警署自首，戴耀廷呼吁所有参与者只同意“参与非法集结”罪。他们当日即离开警署，并未被警方落案检控。直至2015年1月，警方“预约拘捕”三子，控罪包括参与、煽动、组织及协助“未经批准集结”。

2017年3月，“占中九子”收到警方“预约拘捕”通知，控罪改为“串谋他人公众妨碍”、“煽惑他人公众妨碍”，以及“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碍”罪。该控罪在法律界引起部分人士争议。案件在2018年11月开审后，控罪情况如下：

(1) “三子”戴耀廷、陈健民及朱耀明被控第一条罪为“串谋犯公众妨碍罪”。

三人被控于2013年3月到2014年12月期间，持续、活跃公开宣传“占领中环”，包括接受电台节目访问、举办占中商讨日、参与街头论坛等。控方指这是串谋他人非法阻碍中环或附近公众地方，对公众造成妨碍。

控方指Co-Conspirators Rule（共同串谋者规则）在此适用，三名被告均需为当中任何一名被告的言行共同负责。

(2) 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陈淑庄、邵家臻、张秀贤、钟耀华共七人被控“煽惑他人犯公众妨碍罪”及“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碍罪”。

七人被控于2014年9月27日至28日期间，在金钟添美道的台上发言，包括：呼吁示威者留守添美道进行公民抗命，呼吁示威者号召更多人到场参与公民抗命，叫人们循不同方向到添美道参与集会，呼吁带物资到占领区，呼吁、指示示威者紧守警方防线，并向示威者宣讲被捕须知。

控方指，七名被告在此两项罪名属伙同犯罪，需为当中任何一名被告的言行共同负责。

(3) 黄浩铭被控“煽惑他人犯公众妨碍罪”及“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碍罪”。

黄浩铭被控于2014年9月28日期间，在香港金钟分域码头街，以大声公呼吁分域码头街聚集的示威者“反包围”警察，呼吁他们召集更多人到场、扩大占领行动，并呼吁示威者靠近警方防线坐下等。控方指该行为阻碍了一辆救护车去路。

（4）李永达被控“煽惑他人犯公众妨碍罪”。

李永达被控于2014年9月28日下午，在香港金钟夏悫道近添美道，非法煽惑他人阻碍夏悫道车路，对公众造成妨碍，包括用大声公向在龙和道和分域码头街交界聚集的示威者呼吁，请他们前往夏悫道，在行车路上坐下，进行“公民抗命”。



2019年4月9日，占中九子案判决，九名被告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陈淑庄、邵家臻、张秀贤、钟耀华、黄浩铭和李永达到达法院。摄：林振东/端传媒

2. 九子为什么不认罪？罕见地以“公众妨碍”提控集会人士，在法律上恰当吗？

“我们一直倾向认罪，也曾一齐去自首。15年初拘捕我们说‘未经批准集结’，我们都说会认罪。但到正式起诉，突然改为‘公众妨碍’，这是有问题的。”戴耀廷是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他认为，公众妨碍是一个“口袋罪”，通常是控方觉得被告没犯法，但也要控告。他认为需透过抗辩，防范该罪成为案例，形成寒蝉效应，影响未来的社会运动。

香港过去一直很少用“公众妨碍”罪名来提告。据可见的记录，律政司分别在2005年及2008年以“公众妨碍”罪控告Matt James Pearce并成功入罪，案情指Pearce爬上中环一座大厦，以及爬上青马大桥，展示“天安门 4-6-1989，公义必胜”及“中国人民希望从压迫得到自由”等标语。而是次对九子的控罪，是香港首次以“公众妨碍”相关罪名，控告参与集会的人士。

戴耀廷在多次媒体访问、以及他在法庭上做的最后结案陈词里，引用剑桥法律教授J. R. Spencer的话，质疑律政司检控的动机。Spencer在1989年的学术期刊述说：“近年差不多所有以公众妨碍罪来起诉的案件，都出现以下两种情况的其中一个：一、当被告人的行为是触犯了成文法律，通常惩罚是轻微的，检控官想要以一支更大或额外的棒子去打他；二、当被告人的行为看来是明显完全不涉及刑事责任的，检控官找不到其他罪名可控诉他。”

不仅如此，戴耀廷亦质疑以普通法而非成文法的罪名提诉是滥用程序：“若有一适当的成文（法）罪行能涵盖一宗公民抗命案件中的违法行为，我们可以合理地质问为何要以公众妨碍罪来起诉？”

香港法律通常分为成文法和普通法。成文法包含明文规定的条例，大多经由立法会立法程序通过，并成为《香港法例》；普通法则是由法官判决的案例发展出来的法律系统，判决会成为案例，为将来类似案件提供参考。是次对九子的提诉，正是循普通法控告他们“串谋”、“煽惑”及“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碍罪。

成文法通常已经列明罪行的最高刑期，但普通法由于是从案例发展出来，没有列明最高刑期，而是视乎哪一级法院审讯；如不考虑法院级别，最高刑期可以为终身监禁。

“原则上应该用一个清晰的罪名去控告，而不应用较宽广的罪名。”曾在立法会做了18年法律界功能组别议员的大律师吴靄仪向端传媒表示，“公众妨碍”罪名是过时而范围定义不清的罪名，“不知道它究竟牵涉什么，难以辩护，审讯也会因此复杂很多。特别重要的是，刑期无上限。”

她表示过往用“未经许可集结”提诉参与社运人士，通常惩罚较轻，“肯定不会去到坐监的程度。”

不过资深大律师、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汤家骅就认为，公众妨碍是一个贴切的控罪。“用这个控罪（公众妨碍）我觉得比较贴近事实。如果单用‘非法集结’，似乎未能反映一个79日大型妨碍公众运作的运动。我相信从这个角度，警方会尝试用一个以往较少用的罪来检控。”

3. “未经批准集结”与“公众妨碍”的分别在哪里？

“未经批准集结”是公安条例之下的罪名，若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监禁5年；若循简易程序定罪，可处罚款港币5000元及监禁3年，一般在裁判法庭审理。

“公众妨碍”有成文法和普通法之分，前者指 《简易程序治罪条例》 下的“在公众地方犯的妨碍罪”（nuisances committed in public places），涵盖的行为包括将废料、腐肉、恶臭物品放置在公众地方，在公众地方吐痰、大小便等等；后者则是普通法之下的“公众妨碍罪”（public nuisances），即没有在条例中列明，由法庭去裁定所属行为是否构成公众妨碍。

是次对九子的控罪，在拘捕时为“未经批准集结”，后改为循普通法控告“公众妨碍”相关罪名。普通法罪行的刑期视乎哪一级法院审理，本次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审理，但其实是高一级的香港区域法院（地方法院）借用场地，因此最高刑罚为入狱七年。

4. 为什么控告“串谋”、“煽惑”、“煽惑他人煽惑”，而不控告“公众妨碍”？

吴靄仪认为，“这个案件最奇特的地方，就是全部以言入罪。”她表示“串谋”、“煽惑”及“煽惑他人煽惑”全部与被告的言论有关。

“他们不是告公众妨扰，而是告你计划做一件事，而这件事是属于公众妨扰。就算你失败，没人参加，没人把你当一回事，像戴耀廷（在雨伞运动）被（参与群众）骂得很厉害，你都已经罪成，只要你计划的事情属于公众妨扰。”吴靄仪说。

她认为，告“串谋”而非直接告“公众妨扰”，可能是举证需要的问题。“在这样的社会运动里，告你串谋、煽惑，说你讲了什么、写了什么，这都是很容易得到的证据；但我要告你公众妨扰，证据可能好复杂。”她表示要控告九子“公众妨扰”，难点有二：一是难以证明九子造成了雨伞运动这个公众妨扰的行为，甚至三子在运动中其实是被群众杯葛、无甚领导权，正如上庭作供的香港中文大学李立峰教授的学术报告所显示，大部分参与群众并不认为三子的号召是他们参与占中的原因；二是公众妨扰里面还有比例问题——所有和平示威都会造成一定程度公众妨扰，但它们是否合乎比例？

“说他们造成雨伞运动，几乎不可能；但告他们串谋、煽惑，就很容易了，证据确凿，他们都写过意向书，有许多公开文件、记录影片。”吴靄仪说。

控方在结案陈词里，就引用了2017年HKSAR v. Jariabka Juraj案，指该案讨论煽惑罪时，上诉庭法官援引2000年英国DPP v. Armstrong案当中法官Tuckey的判词，指犯罪人煽惑他人时必然带有犯罪意图，而受煽惑者的意图则毫不相干，煽惑没有效果也可以起诉。

汤家骅则对端传媒表示，他认为以“串谋”、“煽惑”及“煽惑他人煽惑”进行提告，是“反映事实”。“一个如此大规模的占领运动，没可能是一个人控制或指挥得了的，用‘串谋’是比较接近事实的情况。”

他又认为“串谋”、“煽惑”的入罪门槛比较高，不仅需要证明有人进行违法行为，还要证明多于一个人一齐去合谋做这个违法行为。

法律界专业团体“法政汇思”成员田奇睿大律师不认同汤家骅的观点。他表示“串谋”的入罪门槛并没有更高，只要能够证明行为人之间有协议，甚至不需直接口头说出的协议，就有机

会成立。

5. 九子罪成，对香港意味着什么？

吴靄仪认为，“占中九子”案的判决，将影响将来示威游行抗议等自由，从而影响香港民主运动。

她表示是次案件令人在意的是其造成的实际效果。“就算今次因为技术理由、法律原则而脱罪，但只要继续可以用这个罪名去控告这种经常发生的集会行为，你已经会感到害怕。谁还敢去发起游行？如果三子如此有计划地公开讲给大家听（占中计划），就已经（被控）这么大罪名，你可以想到寒蝉效应有多深。”

她指出，平日组织大型游行示威活动，申请警方“不反对通知书”时，要填写预期参与人数。今次九子入罪，令人担忧日后组织示威活动时，如若最终参与人数远超期望，是否亦会被控公众妨碍。“你用‘未经批准集结’告不了这些人，但如果她们游行演变成很大规模，很成功，你就可以用公众妨碍来告她们。”

对于这次“煽惑”以及“煽惑他人煽惑”公众妨碍罪成，吴靄仪认为，这会阻吓人们日后做出呼吁群众参与大型抗议活动的行为。“呼吁大家‘出来，我们全香港人这次要反对什么什么’，这是我们每次游行都会做的事情。在自己Facebook呼吁人们上街，这会不会是‘煽惑’他人去做公众妨碍？叫大家‘叫多点朋友出来’，这是不是又成了‘煽惑他人煽惑’？而你呼吁人、策划、参与行动，全都会被警察拿著录影机录影，用来作为证据，罪成要坐好几年监狱。给人看到的整体效果就是这样。”

而汤家骅则表示，“如果法官判了公众妨碍，那么参加的人士就有公众妨碍罪，但他们比较低可能性会被控串谋、煽惑，这对那些参与的学生来讲，影响不大。而且参与人数这么大，执法人员不可能全部控告，所以检控官只会检控带头、最严重犯罪的人。是希望成功制裁、判决，起一个阻吓作用，令社会其他人是将来不会犯同样的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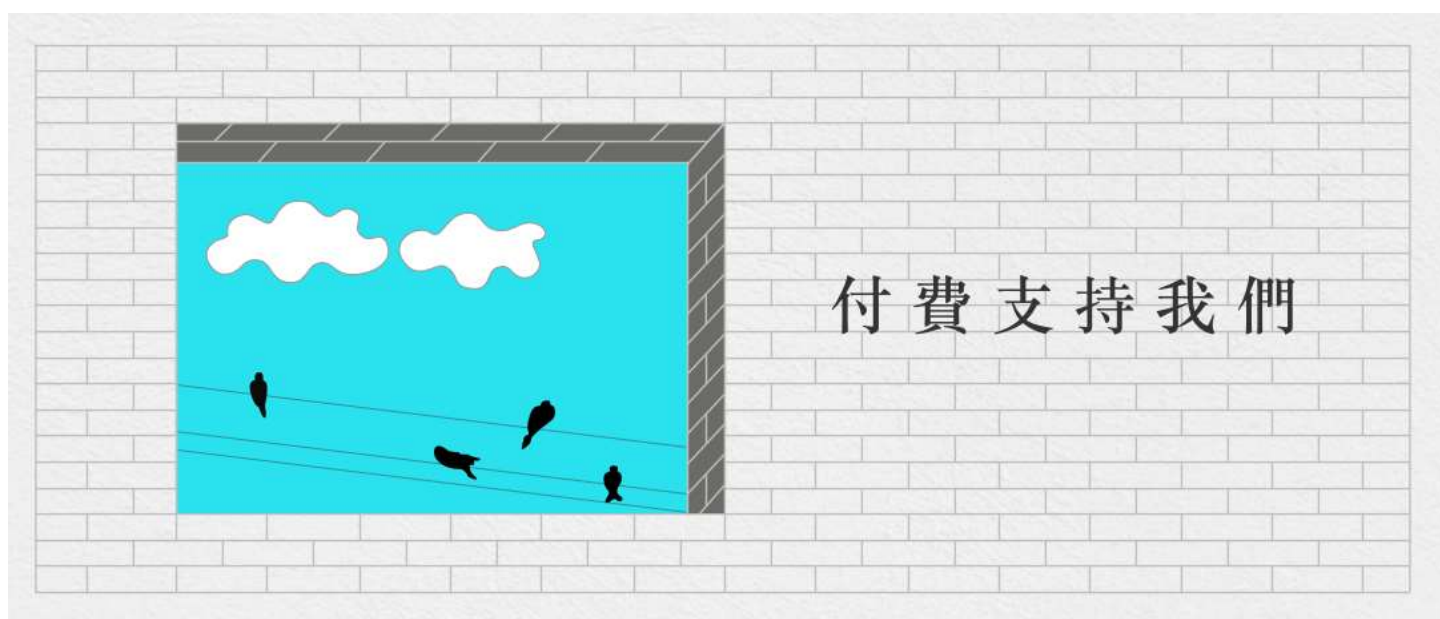
被问及那些参与程度不亚于“九子”中张秀贤、钟耀华的其他学生领袖会否有机会被控公众妨碍，汤家骅称：“律政司如何决定去告谁，这是他们的权利。也很有可能因为举证困难，

他们搜集证据认为他们两人（张、钟）入罪机会比较高，其他人入罪机会较难，或者其他原因，我们外人无法解释，只能接受，看法官怎么判。”

“这个案件非常重要。将来法官判什么叫公众妨碍，公众妨碍在我们今日的人权法之下意味什么，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参考。”吴霭仪说。

（实习记者邓捷对本文亦有贡献）

（编注：更多关于占中九子案的庭审细节，可参阅相关文章里的庭审笔记系列）



2017年7月，端传媒启动了对深度内容付费的会员机制。但本文因关乎重大公共利益，我们特别设置全文免费阅读，欢迎你转发、参与讨论，也期待你[付费支持我们](#)，浏览更多深度内容。

雨伞运动

占中九子案

占领中环



热门头条

1. 小端网络观察：《我们与恶的距离》爆红中国网络，网民感慨“跪著看完”…
2. 专访黄秋生：如果有机会走，留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
3. 早报：法国巴黎圣母院发生严重火灾，尖顶倒下，屋顶坍塌，钟楼安全
4. 下载量破亿的“学习强国”，到底是个什么App（内附漫画+视频）？
5. 四问凉山大火：27名消防员遇难，到底哪里出了错？
6. 朱耀明：敲钟者言——被告栏的陈辞
7. “学习强国”走红后，党在“同温层”里培育下一代？
8. 早报：港人众筹登《苹果日报》头版广告讽刺梁振英，支持他「取代」习近平
9. 中国农村有2000万单身汉，为了娶媳妇，他们都经历了什么？
10. 《非分熟女》导演曾翠珊：有了性，港女可会不再压抑？

编辑推荐

1. 专访黄秋生：如果有机会走，留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
2. 她曾拍摄香港电影巨星的另一面 专访摄影师卢玉莹：“凶、喝、嗲”是她的秘技
3. 疾病王国：未来的我们
4. 吴国光：人文社会研究中的价值关怀——韦伯、后全球化、与中国研究
5. 中国农村有2000万单身汉，为了娶媳妇，他们都经历了什么？
6. 凝视虚无：我们见证人类史上第一张黑洞“相片”，但究竟我们在看什么？
7. 世界银行新掌门上任，会成为中国“一带一路”的对手吗？

8. 占中九子被伏现场侧记：一场平静风暴

9. 李宇森：从占中九子案判词，再思考“公民抗命”还有什么可能性？

10. 碧波押关门大限：在国际艺术交易中心香港，做社区艺术是有多难？

延伸阅读

“风雨底下，我已经污糟邋遢”——解读戴耀廷的六个关键字

“以前研究香港法治，不会将香港法庭放在一个威权社会之下，但那一刻我如梦初醒，原来我们已进入威权时代，香港法院可能失守，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像过的。”

李永达，曾经期盼的牢狱

“我们在香港搞民主运动，连牢都未坐过，好似不像样。”李永达曾盼被判入狱，占中九子案将是他最接近牢狱的一次。他投入社运40年，眼见愿意“推石上山”的人，越来越少，只想对年轻人说：不要放弃。

邵家臻，泪痕满脸的死士

从“占中十死士”到立法会议员，一直伴著他的，除了泪水，就是越来越重的无力感。“当你换个身份，好似多了空间带来改变，但同时间你又会多了好多空间，去面对自己的挫折。”

黄浩铭，最失败的行动派

“这十年我被捕，被控告，选举也输，最失败是我啊！”“但我想告诉他人，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关心都不去关心，如何由零开始变一、变二、变三？”

学者与少年：占中开审，终章未至

占中九子案今日开审，香港司法将为四年前的占领运动刻下定义。运动结束四年，香港风云剧变。当初占领区内，退场与否的争拗曾如此激烈，如今他们各持不同心境，迎接同一场审讯。

重温：占中九子微纪录片：他们的伞后时代

端传媒连日追访“九子”，以微纪录片的方式，记录这些不同世代、不同界别的受审者。有人心怀愧疚，有人冲劲犹在。香港四年“伞后”时代，散落在他们的所思所想里。

占中九子庭审笔记：封桥与催泪弹——警方928部署有否影响占中走向？

开审首星期，庭审焦点在于警方在928的部署与占中走向的关系：发射催泪弹是否促成更多人示威？把通往示威地点的两条主要天桥封锁，是否导致人群走上夏慤道？

占中九子庭审笔记：在陈健民的自辩里，79天占领是否他计划内的占中？

连续两天的审讯，焦点集中在三子从占领开始到他们自首期间，在运动中扮演的角色，陈健民亦解释了“占中”理念及原计划。

占中九子庭审笔记：获许上台宣布占中，三子与学生有误会？

辯方：“你和你的两个同事以及学生代表之间的讨论，其实出现了误会，其实学生没想过你们会在台上宣布占领中环开始？”陈健民：“不同意。”